

[台湾商务印书馆学术经典]

中国历代思想家

清

(二)

庄存与

戴 震

阮 元

包世臣

龚自珍

魏 源

冯桂芬

曾国藩

主编：
台湾中华文化总会
王寿南

中国历代思想家

主编：

台湾中华文化总会

王寿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历代思想家. 清. 2 / 中华文化总会, 王寿南主编; 王法周等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1. 3
ISBN 978-7-5108-0852-4

I. ①中… II. ①中… ②王… ③王… III. ①思想家—评传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6375号

中国历代思想家. 清. 2

作 者	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主编 王法周等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徐尚定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4
字 数	346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0852-4
定 价	32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庄存与 / 1

戴 震 / 19

阮 元 / 73

包世臣 / 123

龚自珍 / 239

魏 源 / 261

冯桂芬 / 311

曾国藩 / 355

庄存与

陆宝千 著



清朝乾隆年间，有一次，政府举行经筵之礼。所谓经筵之礼就是皇帝听人讲解儒家经书的仪式。依照清代制度，每年仲春、仲秋选定吉日，皇帝来到文华殿，左陈四书讲章，右设五经讲章，由直讲官进讲。讲毕礼成，就一齐退班。但是这一次，讲官敷演讲章如仪后，忽然有一个人声称适间的讲章舛误，于是自动上前把先前的讲章，琅琅地发挥了一遍。这一突然的举动，把同列的官员都吓坏了。但是清高宗竟为之少留。这一位能当着皇帝的面不同意讲官所说的人，便是江苏武进的庄存与先生。

庄存与字方耕，号养恬。生于清康熙五十八年。少年时，从舅氏钱先生讲肄，奠定了一生学业的基础。乾隆十年，中一甲第二名进士，也就是所谓的榜眼。授职是翰林院的编修。此后他在宦途上平稳发展，由侍讲而少詹事而湖南、直隶、顺天、山东、河南等地的学政，最后升到礼部侍郎。除正式的官职外，还曾兼了不少差使。如出典浙江和湖北考试，会试时的同考官、副总裁，并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等。但是方耕最重要的兼差，乃是在南书房和上书房行走。尤其后者，是教育皇族子弟的工作，他每日卯入申出，寒暑无间者四十年，深得皇子们的爱敬。乾隆五十一年，以年老就衰，照原品级休致。五十三年，卒于家，享年七十岁。

方耕在宦途中曾有若干政绩，例如改革考试舞弊等，但这些都不如他在学术上成就的重要。而方耕在学术上的成就却曾为当时人所诟病，认为他的工作违反学术的时代潮流。这违反学术潮流的举

动，正如他敢于当着皇帝的面不同意讲官的意见一样，表现了存与对于学术上的特殊见解。

当时的学术潮流是什么呢？是考据之学。几位重要的考据学大师，如江永、戴震、王念孙父子、段玉裁、惠栋、钱大昕、王鸣盛、孙星衍等，都和方耕同时。这些大师们具有如此相同的见解：

（1）圣人之道记载于儒家的经典中。经典由文句所构成，文句由文字所构成。所以后人要明白圣人之道，必须先了解个别的文字，再由文字以了解单独的文句，最后才能通过文句以了解经典，从而可得圣人之道。

（2）儒家的经典，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，受了多次火水兵虫的灾害，难免有散佚的或搀入的。所以后人必须要收集那些散佚的或剔出那些搀入的，圣人之道，庶可复明。

（3）儒家的经典，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抄和印刷，难免有鲁鱼亥豕之处。所以后人必须要加以订正，圣人之道，庶可不为后人所歪曲和误解。

在这种风气鼓动之下，学者们的工作是文字的训诂、书籍的辨讹、辑佚与校勘。真是家称许、郑，人披“御览”。至于真正的圣人之道是什么，却反少有人顾问了。

这时忽然有人向政府提议：作为五经之一的《尚书》，其中一部分是后人伪造的，所以政府应予以明令废止，并且在科举考试中，也不得再在伪经中出试题。此一建议，正足以反映出那时考据学的流风之盛。

《书经》中被清代考据家们断定为伪造的一部分，通称《古文尚书》。其来源是这样的：

据传统的说法，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，实行愚民政策，焚烧民间藏书，并在法律上禁止人民挟书。其后秦朝虽然亡了，而禁挟书令仍过了很久方为汉代政府所取消。在这一段时间内，儒家的典籍

被毁灭了不少。其中《尚书》一种，据说孔子手定时共有一百篇。当始皇禁民间藏书时，济南博士伏胜把此书藏于墙壁内，等到秦亡汉兴，发觉此书历经兵乱已亡失大半，只剩下二十九篇。于是就拿这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学。汉文帝时，征求能研究《尚书》的人，这时伏胜已九十余岁，老不能行；于是政府派晁错前往受教纪录。所以当时不论民间或官方，《尚书》之学，都出自伏胜。这二十九篇《尚书》之外，又有另外一种《尚书》。据说在汉武帝末年，鲁恭王要扩充他的宫室，就拆毁孔子的旧宅，竟发现孔宅墙壁中也有藏书。计有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凡数十篇。这些书都落入孔子后人孔安国之手。孔安国把新出世的《尚书》与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相对照，发现多出了十六篇。这些新出世的《尚书》，都是用汉以前的文字篆书所写的。而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，则是用汉代的隶书写的。所以当时人称新出世的《尚书》为《古文尚书》，伏生的二十九篇为《今文尚书》。《古文尚书》在汉代一直流行于民间，经过汉末大乱，此书又失传了。到东晋时，忽有豫章内史梅賾者，自称获得了孔安国所传的《尚书》，于是献诸政府。后来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定《五经正义》，其中《尚书》一经即以梅賾本为准。《五经正义》在唐代成为国定本，而梅賾本《尚书》自然建立其权威地位了。但是后代的学者，慢慢地对梅賾所献的孔传《尚书》发生了怀疑。例如朱熹就曾怀疑何以《尚书》中时代较早的部分，在文字上反而较为易解。明代的梅鹗即曾写过一本《尚书考异》。到了清初，阎若璩又著《尚书古文疏证》，引经据古，历举一百多证，说明《古文尚书》中矛盾之故。于是梅賾所献孔传《古文尚书》之讹，就成了定案。这时又有毛奇龄为《古文尚书》不平，著《古文尚书冤词》，为孔传古文辩护。在学术界上形成一大争论。毛氏的文词雄悍，穿回引证，但终不能推翻阎若璩的结论，于是《古文尚书》孔传之伪，为世所公认，没有人再研究了。

和方耕同时的考据大家，如江声的《尚书集注音疏》，王鸣盛的《尚书后案》等，都避孔安国之传而专搜汉儒之说，以注二十九篇。故废除伪《古文尚书》，已被当时学术界认为自然之举了。

但方耕却起而反对此一建议。他的理由有两方面，一是学术的：古代的书，十之七八已经湮没，但在伪《古文尚书》中还保存了一二。废除此书，则连幸存的一二也将湮没了。一是政治的：皇室子弟不必也没有机会去做学者，不能旁览杂氏，只有赖“幼习五经之简，长以通于治天下”。假如废掉了伪《古文尚书》，则若干政治上的道理，便没有机会知道了。例如皇帝必须求有德有能的人辅助自己，《尚书·仲虺》说：“能自得师者王，谓人莫己若者亡。”（这是商汤说的话。大意谓君王能求得贤人作师，才可以统治天下，若果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的，则国家一定要灭亡。）《说命》篇说：“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”，“启乃心，沃朕心”。（这是殷高宗对傅说说说的话。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了手和足，才算是完整的身体，一个君主有了良臣，才可以成为圣君。请以你的智慧来增加我的智慧。）《冏命》篇说：“惟予一人无良，实赖前后左右有位之士，匡其不及。”（这是周穆王对伯冏讲的话。大意是说我个人有很多缺点，全靠周围的人来帮助我能力所不及的地方。）君主必须要节俭，《太甲》篇说：“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。”（这是伊尹对太甲说的话。大意是说你应当以俭为德，考虑子孙能永远统治天下的计划。）《旅獒》篇说：“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。不贵异物贱用物，民乃足。”（这是周武王克商以后，西方的旅国贡了一头獒犬来，召公劝武王拒绝接受的话。大意说君主不要做于国家无益的事，国家才能进步。不要注重玩好之物，人民才能富足。）君主用刑必须要宽厚，《大禹谟》说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（这是皋陶对夏禹说的话。大意是说君主对于臣下所建的功劳发生了疑问，则应当从较重的一方面去考虑，对于臣下所犯的罪发生了疑问，则

应当从较轻一方面去考虑。与其杀了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宁可宽恕一个犯了不常见的罪恶的人。）君主应当从事道德修养，《大禹谟》说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（这是舜的话。大意谓人心之有思虑作用，是应付一切事情的根本，可以向好的一面去想，也可向坏的一面去想。所以是很危险的。道心是实现道德行为的根本，是很微妙的。人君应当要精心一意，把握道心使不失其中，然后可以明道安民。）以上《仲虺》、《说命》、《冏命》、《太甲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大禹谟》，都是属于伪《古文尚书》，假使政府通令伪《古文尚书》不得再予研读，那么皇子们无法再从书本中获得这些政治教训了。由于方耕的反对，伪《古文尚书》乃得在国定的儒家经典中，存而不废。

方耕不但挽救了伪《古文尚书》的政治生命，又想挽救此书的学术生命，他作了一部《尚书既见》，发挥其个人的历史见解和政治见解。书中每每引用《古文尚书》来作证。例如他说明君主之重要时，引《太甲》篇伊尹的话：“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。”（人民没有君主的领导，不能发挥互助合作的效力。）指责商纣施行虐政而诿命于天，也引伊尹的话：“自作孽而曰天作孽乎。”此一为《古文尚书》辩护的工作，曾招致很多人的诟病。方耕另在《尚书说》中回答道：“尹躬暨汤”（这是《尚书·咸有一德》中语，意谓伊尹个人和商汤），是《古文尚书》中的话。“二公及王”（这是指《尚书·金縢》中太公、召公和周成王），是《今文尚书》中的事。二者都在说明大臣和君主的一心一德。所以《尚书》是“疏通知远之教，非属辞比事之教”（谓《尚书》乃政治学而非历史书），后人不要轻议古人之书。

方耕之对抗当世学术潮流之另一表现，是研究方向的转变。当举世学者沉酣于旁搜博讨的考据工作时，他却从事于“义理”的探讨，研究的对象是《春秋公羊传》。

按照传统的说法，孔子曾经根据鲁国的史书——《春秋》，加以增删。每增一字或每削一字，都寓有深远的意义。高弟如子游、子夏等都不能帮上一句话。这些增删《春秋》的寓意，谓之微言大义。孔子生前，恐怕触犯时忌，并未记载下来，只是口传于弟子。孔子既歿，子夏把孔子之说授与公羊高，公羊高授给自己的儿子公羊平，公羊平传子公羊地，公羊地传子公羊敢，公羊敢传子公羊寿。到公羊寿才和胡毋子都二人把历代口传的春秋大义用文字记载下来，这便是《春秋公羊传》。这时已是西汉景帝时代了。后来汉武帝要在政府中设立五经博士，《公羊春秋》当时是解释《春秋》之书，所以立于学官，公羊学也变成了官学。

《春秋公羊传》这本书在汉代十分重要，政治上发生问题的时候，都按《公羊传》中的义理作为处理的标准。皇帝的诏书，臣子的奏议，也往往引用此书中的义理作为立论的根据。如果说得夸张一些，此书很类于现代国家中的宪法。但汉代以后，此书却很少人去研究了，主要的原因是缺少了政治上的鼓励。因为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，又置博士弟子员（即博士可以招收学生），按当时政府的法令，博士弟子员通过考试后，可以当公务员（吏或郎）。所以博士弟子员成为入仕之途，五经成为入仕的敲门砖，《公羊传》便是当时热门的敲门砖之一，因此不断有人传授学习。

到了汉末，天下大乱，博士官逐渐废绝，儒家经典慢慢地无人传授了，《公羊传》也逐渐式微。魏晋以后，儒家思想在政治上也失去了直接的指导地位，公羊义理更少有人探讨了。例如东汉时，何休曾经著有《公羊解诂》，发挥公羊的义理。到南北朝时，徐遵明根据解诂作疏，便空言敷衍，无所发明了。唐代以科举取士，主要有明经、进士两科。试明经者，儒家的经典虽然仍为考试的对象，但考生于诸经不必全习。有通五经、三经、二经及学究一经之别。而政府又分诸经为大、中、小三类，以字数的多少为分类的标

准。通经者于每类中任选一或二经,《公羊传》和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列为中经。凡应试之士,目的只在考试及第,都选择容易学习的经书,所以中经一类中,《诗经》成为热门,而《公羊传》与《周礼》便无人顾问了。开元时期,国子司业李元瓘和国子祭酒的杨场,先后请政府对于研习公羊者优予奖励。元和时,韩愈曾写信给朋友道:近来公羊学几乎断绝了,圣经贤传,屏而不省,要妙之义,无自而寻。所以自汉末大乱以后,公羊春秋渐渐少人研习,最后竟成为绝学了。到了庄方耕出来,才把这一绝学加以复活。

方耕在公羊春秋方面的重要著作是《春秋正辞》。这是取法元代赵沍的《春秋属辞》而作的。赵沍把《春秋》上相同的文辞和记事合在一起,分成八大类,每一大类中又各有十数至数十小项。方耕也把《春秋》分类而研究之。共有九大类:奉天辞、天子辞、内辞、二伯辞、诸夏辞、外辞、禁暴辞、诛乱辞、传疑辞。每类中也分若干小项。所不同于赵沍者,他是站在公羊学的立场把《春秋》加以分类而已。此书“义例一宗公羊,起应实述何氏”,但亦间采《左传》、《谷梁》。所以义周旨密,博辨宏通,成为解说《春秋经》的卓绝之作。

方耕在此书中继承并发挥了公羊学的理想性。原来公羊学家有一基本观念,乃“以春秋当新王”。即以春秋时代为继周而起之新王朝,此新王朝之王为“孔子”。但孔子有德而无位,在现实上并未真正成为王,所以其政治理想只能藉修改鲁史《春秋》表现出来,《春秋》乃成为孔子之政治哲学。方耕说:“大哉受命,钊我至圣”,也是承认孔子为继周受命之王。《春秋》上记载鲁隐公七年“滕侯卒”,方耕解说道:滕国原来是“子爵”,这里为何要称之为“侯爵”呢?这是因为做天子的才能改元立号,爵命诸侯。孔子这样写法,正表示自己是一个天子,表示“春秋当新王”是一个不同于周的新年代。

这一个新时代中的王，是政治革新的重心和起点。《春秋经》的第一句“元年春王正月”。方耕引用何休的话“政莫大于正始”。所谓“元”，便是元气，乃是天地之始。《春秋》用“元”表示天地开始之正。以天地开始之“正”来“正”君主的政治。以君主的政治“正”诸侯的即位。以诸侯之即位“正”境内的政治。又引董仲舒的话：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这便是所谓“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”。这新时代的“王”者，负些什么责任呢？方耕曾在讨论《尚书》的时候表示其意见：“古人所谓统治天下者，难道仅为了受人民的朝觐，征人民的贡税，用人民的劳力吗？主要乃是能使民心悦服，不良的风俗革除，每一人在政府统治之下，都能依其天赋而自由发展和完成其人格。”

这新时代的王所统治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？是一个“大一统”的国家。《春秋》第一句“元年春王正月”，公羊家解释“王正月”的意义是“大一统也”。方耕引用此文，表示他同意这一见解。又引《礼记》上的话加以申说：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。”他非常推重齐桓、晋文的霸业，认为齐桓“虽曰薄德，赖此一匡”。一匡是指天下因齐桓公之努力而免于分裂。其后在晋文公的努力下，各诸侯又“东西究海，搏心一力”。方耕心目中的大一统，并非指全国仅有一个政治领袖而已。董仲舒曾说“春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”。所以建议汉武帝“诸不在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”，“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”。方耕引用董说后，加以阐释：“此非春秋事也，治春秋之义莫大焉。”故他心目中的大一统，乃以法度的统一为内容。

此大一统之国，是有丰富的文化的，其中保存了前两代的礼乐。公羊学家有“通三统”之说。他们以为凡一个新王朝建立后，必须封建两个大国给前两代王朝的子孙，使各保存其固有文化。这两个

王国和当代之王朝同时并存，便是“通三统”。所以周王便存禹之后于杞，存汤之后于宋，“使皆服其服，行其礼乐”。此外公羊家又有九皇、五帝之说。他们以为王、帝、皇三者是不同的。“天下往归之谓之王”。即天下的人都自动的归向于一个人，则此人便称为王。至于过去的王，近一点的便称之为“帝”，远一点的便称之为“皇”。如果以周代为准，则周本身与夏禹为三统，夏以上自舜至黄帝为“五帝”，神农以上则为“九皇”。五帝、九皇之后，也都封以小国。九皇以上的君主之后，便降为平民了。现在既以春秋时代为新王朝，则“夏”便应归入五帝，而“周”与“宋”则被封为大国，和“春秋新王朝”与“通三统”。然而在现实上，孔子既未成为真正的王，所以通三统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措施。孔子只能在《春秋》上的文字寄托其意。《春秋》上常书“春王正月”、“春王二月”、“春王三月”，而没有“王四月”。公羊家作这样的解释：夏朝以建寅之月为正月，商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月，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（按：中国古历法把冬至日到次年冬至日这一段时间平分为十二小段，以子、丑、寅、卯等地支作为每一小段的专名。建子，便是以第一小段为一年的正月），所以周的二月便是商的正月，周的三月便是夏的正月。二月、三月上都有“王”字，表示夏、商二朝之王依然同时存在，这便是《春秋》书法的“通三统”。方耕对于通三统之说，是同意的。曾引夏书“怠弃三正”（见《甘誓》篇）的话，证明周代以前也是“三正并行而不悖”。并且称通三统的作用，对今王朝是“师法在昔”，故在文化上能够“文质再复，制作备焉”（商的文化风格是质朴，周的文化风格是富丽，再复，是指春秋新王朝的文化由富丽返于质朴）。

此大一统之国，其文化是不断发展的。公羊家有张三家世之义。其说略谓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，鲁国共历十二君。此十二君中，孔子所及见者为昭、定、哀三公时代之事，是谓所见世。孔子所不及

见而能由孔子的前辈中可以闻知该时代之事者，为成、宣、文、襄四公时代，是谓所闻世。孔子所不见并且亦无耆老可询，只能由记载、传说以知该时代之事者，为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五公时代，是谓所传闻世。二百四十年之事，既有所见、所闻、所传闻之不同，故《春秋》记载之文词亦有所不同。这种不同的异辞，公羊家以为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所在。于所传闻世，表示国家在衰乱之中有安定之兆。于所闻世，表示国家已至升平，于所见世，表示世界已至太平。此三世之义，实为历史进化，文化发展之史观。方耕说：“拨乱启治，渐于升平，十二有象，太平以成”。可见他也是同意此三世之说的。

此一大一统之国，其内部有一理想之制度。汉代公羊家有一传说，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乃是预为汉代立法的。方耕否认此一说法。他以为孔子在《春秋》中所寓之法乃是“以治万世，汉曷颙焉”。但在未行此“万世法”以前，方耕在消极方面，不主张改革旧的比较适宜的制度。他曾致力于《周礼》的研究。《周礼》原有六篇，其中《冬官司空》已经阙失。他以为《周官》之“式法根氏皆在《冬官》。《冬官》存，举而错之天下，无难也”。于是为《冬官》拟补其文，作《冬官司空记》一篇。另外又采撮周秦之旧书，别辑为《司空记》一篇，颇有为后世制法之意。

此大一统之国，当然是内行仁政。《春秋》记梁之亡国，由于梁国的君主隆刑峻法，百姓相率离去，形成鱼烂而亡。公羊学者批评梁国并没有受到敌国的侵略而灭亡，是“自亡也”。方耕也说梁君“孰非自取，不仁甚焉”。《春秋》记邻国的君主被人俘获，用他的血祭之于社。公羊学者以为这是一件不人道的事。但是方耕说：难道邻国的君主没有过失吗？“兵败国亡，身奔走，威不得谓之无恶也。”可见他是主张国家应当自强的。

此大一统之国，其人民对四周文化较低民族而言，具有强烈的

民族意识，是谓夷夏之大防。《春秋》于鲁僖公元年记“楚人伐郑”，二年记“楚人侵郑”，三年又记“楚人伐郑”。《公羊传》于此都没有解说，但是方耕说楚国在《春秋》中有不同的称呼，如果他服从中国，便称为“楚子”，假使他侵略中国，那便称他为“楚人”。这连续三年中楚国侵略郑国，是侵略中国的开始。“四夷病中国莫楚若近也”，所以“始人之也。”可见方耕是有浓厚的民族意识的。

然而此大一统之国，并不主对外侵略。《春秋》记鲁桓公五年“夏，齐侯、郑伯如纪”。方耕以为按《春秋》书法，鲁国以外的国家“相如”（一国的君主到别国去拜访谓之相如）是不记载的。此处特别记载此事，因为齐、郑二君到纪国去是偷袭纪国。一个平民外表装着和好的态度，内心怀着偷盗之意，便可称之为贼。现在身为诸侯者，也怀有偷袭别国之心，连平民都不如了。但是为何《春秋》不称之为齐人、郑人而仍称之为齐侯、郑伯呢？（《春秋》通例称人是贬辞，称爵是褒辞。）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不能算是人，所以不必“人之”，反而仍予以侯伯之名，是让他们“庶几愧愤死乎”。方耕为何这样地反对战争呢？因为战争乃是“糜烂其民”。《春秋》记鲁桓十年“冬、十月二日，丙午，齐侯、卫侯、郑伯来战于郎”。十一年“春、正月，齐人、卫人、郑人盟于恶曹”。方耕以为《春秋》称他们为“人”者，“贬之也”。因为《春秋》痛恶侵略战争，尤其痛恶糜烂其人民的战争。此次郎之战，特别记下“丙午”那一日，是“痛此苍生同日而就死也”。方耕因为反对侵略，所以也反对灭人之国。鲁隐公二年，展无骇率师灭了极国，这是春秋灭国的首次纪录。按《春秋》书法，凡是尊重一国的大夫，其名上一定要加“氏”。无骇的氏就是“展”。但《春秋》记载这一件事，只说“无骇帅师入极”。后来展无骇死了，春秋也只记“无骇卒”。自始至终，都不为无骇加氏。公羊学者的意见是此乃孔子痛恶展无骇首开灭国纪录的表示。方耕也同